

中国国情与发展丛书

中国经济波动报告

胡鞍钢 著

ZHONG GUO JING JI

BODONG

BAOGAO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国情与发展丛书●

中国经济波动报告

胡鞍钢 著

1055/08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章

登录号

464961

分类号

F12/123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波动报告/胡鞍钢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12
(中国国情与发展丛书)
ISBN 7-205-03199-0

I. 中…

I. 胡…

Ⅱ. 经济发展-道路-研究-中国

IV. F120.3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313 千字 印张: 16 $\frac{1}{8}$ 插页: 5

印数: 2001—5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永富
封面设计: 李国盛
插图: 金姗姗

版式设计: 赵耀今
责任校对: 孙明慧 杨立中
安丽君

定价: 21.00 元

《中国经济波动报告》中文提要

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它表现为经济扩张因受到资源供给约束或者消费需求约束而出现经济收缩；经济收缩又因资源供给充裕或者消费需求拉动而重新进入经济扩张；周而复始，不断循环。

通常，经济周期波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否认存在经济周期现象。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存在经济周期波动，而且出现多次的经济衰退，甚至爆发经济危机。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经济波动较为明显的国家之一。它们构成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两大显著特点。

本书中心讨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总是大起大落？二是如何防止和避免中国经济发展大起大落？

2 中国经济波动报告

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只要我们比较客观地承认这一现象，十分认真地分析这一现象的本质及症结，老老实实地按经济规律办事，才有可能防止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上述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点

建国四十多年来，中国先后经历了多次的经济周期和经济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特点之一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周期波动，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政策的扩张——紧缩（调整）——再扩张——再紧缩（再调整）的反复变动过程。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特点之一，也是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之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经济稳定，则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经济不稳定，则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是：

——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经济发展是有起必有落，大起必大落。改革以来已经出现四起三落。

——每次经济周期长度不尽相同，呈不规则变化，一般而言，扩张期长度大于收缩期长度。

——各周期波动幅度（指真实 GNP 增长率偏离增长率均值的标准差）差异甚大，改革以来经济波动幅度呈现明显减缓趋势。

——经济波动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系数（指真

实 GNP 增长率标准差与增长率均值之比)愈大,经济增长率均值就愈低;反之则反。改革以来,经济波动系数大幅度下降,这是与中国经济增长道路的决定因素发生变化密切相关的。但经济波动和经济不稳定仍然是核心的问题。

——每两个周期(指短周期)构成一个中周期,平均每 10 年出现一次较大的经济调整。

——中国经济波动系数大大高于西方国家,也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据作者计算,1960—1989 年期间,中国经济波动系数约为前南斯拉夫、英国和印度的 1.8 倍,美国的 2.2 倍,日本的 2.6 倍,韩国的 3.0 倍,前苏联的 3.4 倍,世界平均水平的 4.3 倍。

——中国经济波动是以外部冲击为主,内部传导为基础的波动类型。反映外部冲击作用的循环分量波动幅度相当高,同时反映内部传导作用的趋势分量波动幅度也高于同期美国的水平。

此外,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还有其他特点。例如,除了经济总量(GNP)增长波动之外,还有十大类型经济变量波动:生产波动、投资波动、消费波动、工资波动、货币波动、信贷波动、价格波动、财政收支波动、商业和库存波动、外贸波动;中国不仅存在全国性经济增长波动现象,还存在地区性经济增长波动,反映了中央政府任何一种经济政策(无论是扩张政策,还是紧缩政策)都会对全局产生深刻影响。

大量数据和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十分明显的,经济增长始终处于很不稳定状态,这种大幅度的频繁的周期

振荡，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周期发展过程：从大起到大落

尽管每次中国经济周期和重大经济调整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仍具有类似的过程和相同的特点。

每次经济周期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经济复苏期或经济扩张期；经济繁荣期或经济高涨期；经济调整期或经济紧缩期；经济衰退期或经济低谷期。

(1) 经济复苏期或经济扩张期。

假定经济增长从前一次低谷点开始进入经济复苏期。由于前一次经济衰退造成大量闲置生产能力和生产潜在能力，在投资增长的带动下逐渐复苏，并开始发挥作用。由于连续性的技术进步，投资积累，劳动力调整，从供给要素方面为经济复苏准备了条件。由于连续性的人口增长、消费需求增长、国内外市场扩大，以及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扩张，从需求市场方面为经济复苏准备了条件。经济复苏期的主要任务是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使实际生产能力接近或达到充分生产能力。一旦恢复到原有的生产水平，就完成了经济复苏，开始新的经济扩张。

在经济扩张初期，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形成经济建设高潮的机会已经到来，号召全国抓住时机，加快经济建设，争取高速增长。各地方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普遍争上投资项目，投资规模扩大，投资增长速度上升。与投资增长相联系的资本货物（如原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能源、交通等）需

求迅速扩大，又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工业生产高速增长，货币发行超量投放，银行贷款激增，财政支出明显增加，消费基金迅速膨胀。这一时期中央向地方下放更多的权力，包括下放投资审批权限，放松贷款额度和限制，扩大市场机制范围，赋予地方更多的优惠政策，减少地方上交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各地方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国出现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经济跃进景象。对此新闻界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造舆论，使人们感觉“形势大好，愈来愈好”。

(2) 经济繁荣期或经济高涨期。

经济繁荣期是指经济增长率以一个暂时的高速度增长的时期。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增长趋势，并接近潜在生产能力上限。经济扩张不是无限的、任意的，它必然受到资源供给约束（如资金、能源、原材料供给约束）和增长瓶颈约束（如交通、通讯瓶颈约束）。

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和制约条件面前，领导人有两种选择的可能：一是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抑制社会总需求迅速扩张，采取温和的紧缩政策，实施反周期措施。但是作出这一选择，对中央领导人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这无疑给“热火朝天”的大好形势泼了一盆冷水，既挫伤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也会遭到各地方官员的普遍反对。他们常常倾向于选择另一种作法，进一步解放思想，运用各种非经济手段，企图突破资源约束，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包括：大搞群众运动，发动大跃进，反对保守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动员新

的非经济要素资源（指群众干劲）；修改年度计划或者五年计划，大幅度提高产值或产量指标，重新分配资源，超额发行货币，超规模发放贷款，大量举借国债和外债，增加财政向银行透支，扩大可分配资源。

中央领导人的急于求成，各级地方政府的急于求上，千千万万厂商的急于求快，十几亿老百姓的急于求富，这四股力量汇集在一起，目标一致，共同推动整个经济增长急剧走向高峰。这时的中国经济如同制动闸失灵的特别快车，没有任何办法（包括小调整、局部调整或者软着陆）可以减速下来，或者停止下来，除非来一次伤筋动骨的急刹车式的重大经济调整。

此时，领导人和经济学界就经济增长是否“过热”出现不同意见，面临的是调整还是不调整，是早调整还是晚调整，小调整还是大调整，是“点刹车”还是“急刹车”的争论与选择，由此产生深刻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

（3）经济调整期或经济收缩期

经济发展大起必然引起经济发展大落，这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每次较大幅度的经济波动，都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农业歉收，粮食产量停滞甚至下降，使“吃饭”问题十分突出；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投资规模过大，且超越国力；连续超额发行货币，发生高通货膨胀率，直接损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居民阶层的利益，引起社会公众普遍不满；连年巨额财政赤字，使政府困惑于财政危机之中；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能

源电力供应不足，交通运输十分紧张，缺电缺煤缺材（指原材料）又引起开工不足，部分生产能力闲置；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商品库存量大量积压，经济效益不断下降；进口量急增，国际收支恶化。

“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央政府是经济波动的发动机，又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只要出现如下情况中央政府就会被迫决定实施重大经济调整：全体居民消费超过农业供养能力，基建规模超过社会供给能力，通货膨胀超过群众承受能力，信贷规模超过银行支付能力，地方盲目行为超过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中央就会召开紧急会议（例如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或者省长会议等），连续下发中央文件，决定经济调整，并正式成为中央政府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建设方针。

此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厂商和老百姓的目标不一致了，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目标形成尖锐矛盾，前者坚持经济调整，而后者继续坚持经济扩张，前者坚持经济稳定，而后者继续坚持加剧波动。最后中央被迫采取“一刀切”或者行政手段强行在全国实行经济调整。

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些几乎相同的经济紧缩政策和经济调整措施：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削减财政支出，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增长。同时中央向地方收回下放的各种权力，强调各地方服从中央，加强行政手段干预，普遍进行财经违纪大检查，增加中央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号召人民勒紧裤带或者过几年紧日子，中央公开或者内部承担经济决策失误责任，

保证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一旦削减投资规模，经济增长率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随之下降，并低于生产能力水平；大量企业停工停产，开始进入经济低谷期。此时，通货膨胀率在惯性作用下，继续攀升；企业之间的债务危机开始爆发，并迅速形成“债务链”。

(4) 经济衰退期或经济低谷期。

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严重衰退，经济增长率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降至远低于增长趋势的水平上，甚至出现负增长，大量生产设备闲置，能源紧缺、交通瓶颈约束作用有所缓解。资金从工业部门流向农业部门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增长。投资下降引起资本货物需求下降，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矛盾。

但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大量公开的或隐蔽的失业人口群，社会犯罪率上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贫困人口增多，群众普遍不满，社会矛盾尖锐冲突。这是经济发展的艰难时期。通常中央政府制定较为适宜的经济增长目标，采取较为谨慎的经济稳定政策：稳定增长、稳定通货、稳定信贷、平衡财政、支持农业、调整结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复苏。

当经济逐渐复苏，全面回升时，又开始进入下一个经济周期。

农业波动是经济波动的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的真正含义是，农业波动是

经济波动的基础；农业稳定是经济稳定的基础。解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届政府的首要任务，“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形象地说明农业生产以及粮食生产波动是中国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稳定的基础。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农业波动与经济波动这一特殊关系就在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中国最突出的国情特点是：人口过多，农业资源相对紧缺，粮食消费量大，农业供养人口能力不足。具体表现为：

——庞大的人口群对耕地资源造成持久的巨大压力。人口激增，耕地减少，两者逆向发展，导致人均耕地呈下降趋势，达到中国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中国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产品商品率水平低，每个农业劳动力仅供养3.4个人口（还包括农业劳动者本人）。农业收成好坏直接影响广大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

——中国农业是高投入、高集约、高单产、高成本类型的农业。只要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农业产出不是停滞就是下降。

——中国农业极易遭受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抗灾能力较差，多半耕地还是靠天吃饭。

农业是国民经济最基础的部门，又是最薄弱的部门，也是经济波动最敏感的部门，农业波动系数高于GNP波动系数，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又高于农业产值波动系数。据作者计算，1953—1991年期间，粮食总产量、农业总产值、国民收

入增长率波动系数分别为 231%、144% 和 130%。

为什么农业波动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波动呢？

——农业部门是广大城乡人民基本食物的主要供给者。中国居民膳食结构是以植物型为主，粮食是人民食品消费的主要来源。农业产出下降，特别是粮食产量下降，引起农副产品供应短缺，导致农副产品价格急剧上涨。食品价格上涨还抬高了工业劳动成本，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从而推动价格总水平上涨。农业产出波动影响价格波动。

——农业部门是消费品工业（指轻工业）原料的主要供给者。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比重高，尽管这一比例不断下降（1952 年为 87.5%，1987 年下降至 70.1%），但是轻工业农产品原料需求的绝对量是不断上升的。农业产出下降，导致轻工业原料短缺，农产品原料价格上升。农业产出波动直接影响消费品工业波动，间接影响资本货物工业产出波动。

——农业部门是出口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农业产出下降，影响农产品及加工品的出口量，同时也增加农产品进口量，例如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农业波动直接影响出口波动，间接影响进口波动。

——农业部门是工业产品的主要需求者。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绝大多数，是国内最大的市场，既包括生产资料市场，也包括消费品市场，成为工业部门发展的前提条件。农业产出下降，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下降，影响农业对工业品的购买量，减少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农业波动直接影响商业波动，间接

影响工业产出波动。

——农业部门是人口与劳动比重最大的部门。农业产出下降，使得“吃饭”问题突出，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稳定，迫使政府削减对工业投资支出，引起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农业产出波动直接影响投资波动，间接影响工业产出波动。

——农业部门是国民经济主要组成部门。农业产出下降，直接引起 GNP 总量减少。农业波动直接影响经济波动。

农业波动影响经济波动有如下特点：

——农业波动对经济波动影响具有滞后性影响。通常是农业和粮食增长波动在前，经济增长波动在后。上年农业和粮食增长率上升时，次年国民收入增长率随之上升；反之，则随之下降。

——农业波动幅度高于经济波动，且对经济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农业部门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部门，也是经济波动最为明显的部门。

——农业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递减性，但是仍有很强的制约作用。这是因为农业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以及农业波动幅度不断减小的双重作用结果。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紧缺，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大国中，农业收获的丰歉对经济波动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农业增长速度制约 GNP 增长速度和工业增长速度。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稳定粮食增长，才能稳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

现代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经济系统对外部冲击的响应曲线，它是外部冲击与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表现为：(1) 外部冲击 (shocks)，包括随机冲击或者序列相关冲击；(2) 初始响应 (responses)，出现一个初始振幅，振幅大小取决于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与特性；(3) 振荡衰减 (damped oscillation)，由于经济系统的结构特性与制约性所产生的内部阻力所致；(4) 循环运动 (cycles)，转化为重复出现的经济周期。上述过程可由系统响应曲线来描述 (例如利用动态联立方程计算和模拟这一过程)。

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外部冲击。这包括来自经济扩张期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冲击”和经济收缩期中央政府的“政治命令冲击”。前者是采用扩张政策，后者是采用紧缩政策。之所以称为“外部冲击”，因为它们不是经济因素，而是非经济因素，主要是政治因素和行政手段，对经济正常发展具有强烈的冲击干扰作用。

每次经济扩张期与各次党代会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从1977—1993年的17年中，共计召开了四次党代会，形成了四次扩张期。作者发现，在党代会召开的当年经济增长率高于上一年 (平均GNP增长率为9.2%)，第四年较低 (为8.3%)，第五年最低 (为6.7%)，根据作者动态模拟，由于党代会召开影响当年GNP增长率比正常年份多上升3.3%，投资增长率多上升12.4%。仅1992年因党的十四大召开，当年GNP

增长率比正常年份高出 3.8 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高出 19.2 个百分点（作者是采用二阶自回归动态方程模拟政治动员冲击影响）。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产生新的领导人，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拟定新的经济计划，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发出新的战斗动员口号，在党内外和全国上下普遍取得共识，掀起新的经济建设高潮。这种政治动员对经济扩张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作者这一结论得到实证计算的验证。

“政治动员冲击”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扩张期的“技术冲击”（指科技进步，厂商技术创新），属于非经济因素，且具有放大响应效应。系统的响应就是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经过一个短暂的“传达动员”通讯期，各地方、各单位积极贯彻中央精神，纷纷制定行动计划。在信息社会，中央指示精神是人人皆知的，中央的经济计划指标就成为省区经济计划指标的下限。当中央把经济增长率指标由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这就使得各省区经济增长率指标至少要提高到百分之十以上，相应地市县经济增长率指标则会抬得更高。层层加码，逐级放大。这些经济行为反映在“投资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最终表现为“经济过热”。

当经济增长愈来愈快，中央政府因缺乏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又不能有效使用经济手段，例如大幅度提高贷款利率控制货币需求，抑制经济过热。当地方政府以及厂商响应的盲目性，危及全局经济稳定，中央政府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由于这一政策是以政治命令的形式下达的，它比采用市场经

济手段的“自动刹车”机制来得要快，基本采用行政手段的“急刹车”机制。故称为“政治命令冲击”，或称“急刹车冲击”。

每次经济收缩期与历次中央政府经济紧缩期政策密切相关。“急刹车冲击”是导致经济增长曲线出现转折点并进入经济收缩期的直接原因。经济调整成为中央政府处理各类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以及农业危机）的主要手段。随着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及其规模，严格控制信贷发放及其规模等经济整顿措施出台，经济增长率在发生转折之后，迅速下降，进入经济衰退期。根据作者动态模拟，由于实行经济紧缩政策，GNP 增长率比正常年份下降 4.8%，投资增长率下降 17.0%。

“政治动员冲击”与“政治命令冲击”不仅直接导致中国经济波动而且呈现政治性经济周期特点。这一特点是指，党代会前后实行促使经济繁荣的扩张政策，政治动员获得地方政府、厂商和老百姓的积极响应和一致拥护，导致经济高涨。但是“经济过热”的代价是在党代会之后显现出来，这包括急剧上涨的通货膨胀，规模愈来愈大的基本建设等等。中央政府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结果经济衰退。上述非经济因素的政治冲击的周期性交替变化直接影响经济扩张和经济衰退，形成连续性的经济波动。

在西方国家，商业周期是由无数厂商盲目性以及经济信息不确定性所致，中央政府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但是在中国，当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一低之间反复变化时，